

和行动来确定各不相同的本性，确定自己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而且，他特别欣赏那些反抗常规、常识的反叛者，就比如以罪为善、以恶为美的热内。

萨特否认有先天的人性，是因为他不愿意他所倡导的绝对自由有任何的限制。但人作为人，与生俱来就是有一些共性的，这些共性客观上会构成对人的作为的一些限制，而且，要想社会不崩溃，文明不中断，还会有后天的行为和手段的限制。人并不是无限可能或绝对自由的。人还是社会的一种共在。人有许多不自觉的受限，而自觉的受限，恰当的约束自己的自由，恰恰是对他人的平等自由和社会的一种尊重。

《新民周刊》：萨特与法国共产党的关系也经历了变化，早期是共产党的同路人，即便与法共决裂之后，萨特依旧支持学生运动，依旧是著名的左派，福柯称他为“法国最后的公共知识分子”。您认为萨特的这种左派立场，更多的是从他自己的哲学出发的产物，还是受到马克思主义影响的结果？

何怀宏：萨特是一个惯坏了的孩子——在家里被母亲惯，长大了被社会惯，他小时候曾经是一个“乖孩子”，所以他长大了极力要“反抗”，但就连这“反抗”也是受宠的，尤其是在法国这样一个与其他国家比较起来相当崇尚文学和知识分子的国度，而他拥有写作的巨大天赋。说这些也是为了说明一下萨特自己其实也是多么受他的天性和生活环境的制约。

萨特几乎从来没有过底层生活的经验，他到工厂去演讲，工人们听不懂他说的话，结果听众几乎都是他带去的人。但他的确很大方，挣得多也花得多，给学生激进组织等捐款。他在《辩证理性批判》中尝试统一他的存在主义哲学和马克思主义，但这种尝试注定是不成功的。一种极端个人主义的哲学怎么能和一种强调集体行动的社会政治理论相容？我也不认为萨

特受过马克思主义多大的影响，虽然他曾经相当坚定地支持苏联。

《新民周刊》：1981年，《萨特研究》出版，这一年，柳鸣九先生去了法国，见到了波伏瓦，得到波伏瓦的支持引进和翻译萨特的著作，迅速在中国掀起了一股萨特和存在主义的热潮。今天我们应该如何看待萨特和他的存在主义？

何怀宏：80年代初的中国的确出现过一段时间的“萨特热”，但是要看到，当时中国学人是在长期封闭之后突然接触到他的。那时我们对他的哲学在现代西方思想谱系中的位置并不太了解，不太清楚他和加缪的争论，他和阿隆的长期思想对峙，甚至也不知道他的思想影响从六七十年代起就已经大为衰退。更重要的是，我们如果结合我们的经历，尤其是结合践行他的思想的经验教训之后，我们对他的思想应该有比较清醒的认识，而这需要时间。

但是，话说回来，我们虽然对萨特的哲学和政治思想要保持清醒乃至警醒，他的著作尤其文学作品却还是很值得一读的，连他的对手阿隆也佩服他的才华。他提出了一些人类的极端处境，鼓励人们自主选择，还是有一种思想借鉴的意义。民

萨特在咖啡馆。

